

一个

# 战地记者

## 的抗战史

(下卷)

我将自己当作一个百年后的史人来审订史料，  
力求公正、真实，要对得起战场上的将士，更要  
对得起下一代读者，绝不歪曲事实。——曹聚仁



曹聚仁 著

一个  
战地记者

的抗战史  
(下卷)

曹聚仁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 曹聚仁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060-7904-4

I . ①—… II . ①曹… III .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 ①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4943 号



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 YIGE ZHANDI JIZHE DE KANGZHANSHI )

作 者：曹聚仁  
责任编辑：姚 恋 吕晓芬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36.75  
字 数：564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904-4  
定 价：78.00 元（上、下）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 目

# 录

扉语：我们的献词 \_\_ 001

## 第一章 引 论

- 第一节 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 \_\_ 002
- 第二节 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 \_\_ 007
- 第三节 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_\_ 012
- 第四节 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 \_\_ 017
- 第五节 中日纠纷与国际 \_\_ 023

## 第二章 日本侵略战序幕

- 第一节 日俄战后日本侵略满蒙之阴谋 \_\_ 030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_\_ 037
- 第三节 中国诉之于国联 \_\_ 042
- 第四节 “一·二”八淞沪战役（上）\_\_ 047
- 第五节 “一·二”八淞沪战役（下）\_\_ 052
- 第六节 伪满洲国登场 \_\_ 056
- 第七节 长城战役——塘沽停战协定 \_\_ 061
- 第八节 阴霾中之华北 \_\_ 065
- 第九节 国人之抗战情绪 \_\_ 070
- 第十节 西安事变 \_\_ 074
- 第十一节 英、美、苏联及德国之远东政策 \_\_ 078

### 第三章 抗战第一期（上）

（“七七”事变—二十六年十二月）

- 第一节 暴风雨之前夕 \_\_ 084
- 第二节 “七七”卢沟桥事变 \_\_ 090
- 第三节 平津失陷 \_\_ 096
- 第四节 向“战争”迈进 \_\_ 101
- 第五节 淞沪防御战（前期）——“八一三”战役 \_\_ 107
- 第六节 华北防御战（上）\_\_ 115
- 第七节 淞沪防御战（后期）——“八一三”战役 \_\_ 121
- 第八节 华北防御战（下）\_\_ 127
- 第九节 大湖南北地区诸战役 \_\_ 133
- 第十节 南京防御战及芜湖、杭州战斗 \_\_ 140
- 第十一节 中日战后之国际反应 \_\_ 146
- 第十二节 战时朝野动态（一）\_\_ 151

### 第四章 抗战第一期（中）

（二十七年一月—五月）

- 第一节 南京陷落后之新情势 \_\_ 156
- 第二节 津浦沿线作战 \_\_ 161
- 第三节 鲁南防御战 \_\_ 166
- 第四节 陇海沿线作战 \_\_ 179
- 第五节 北战场之苦战 \_\_ 189
- 第六节 江南战场之演变 \_\_ 195
- 第七节 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上）\_\_ 199

### 第五章 抗战第一期（下）

（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月）

- 第一节 泥淖中之日本 \_\_ 204
- 第二节 武汉会战（上）\_\_ 210

- 第三节 敌海军之沿海活动 \_\_ 223
- 第四节 武汉会战（下）\_\_ 227
- 第五节 北战场之游击战 \_\_ 239
- 第六节 第一期战事中敌我之战略与战术 \_\_ 243
- 第七节 国际暗云之投影 \_\_ 248

## 第六章 抗战第二期（一）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年四月）

- 第一节 武汉撤退后之新情势 \_\_ 254
- 第二节 南昌随枣诸战役 \_\_ 270
- 第三节 长沙第一次会战 \_\_ 277
- 第四节 国际风云与日军南进 \_\_ 286
- 第五节 桂南粤北诸战役 \_\_ 297
- 第六节 敌军在华北之扫荡攻击 \_\_ 303
- 第七节 敌伪之政治经济攻势（下）\_\_ 311

## 第七章 抗战第二期（二）

（二十九年五月—三十年十二月）

- 第一节 鄂西、鄂北、鄂中诸战役 \_\_ 318
- 第二节 上高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 \_\_ 328
- 第三节 浙闽沿海地区诸战役 \_\_ 334
- 第四节 粤北及桂南反攻战役 \_\_ 340
- 第五节 北战场之两种战斗 \_\_ 348
- 第六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_\_ 357
- 第七节 战时朝野动态（二）\_\_ 371

## 第八章 抗战第二期（三）

（三十一年一月—三十三年十月）

-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之军事情势 \_\_ 378
- 第二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及浙赣战役 \_\_ 383

- 第三节 缅甸防御战 \_\_ 393
- 第四节 湘鄂皖诸战役 \_\_ 398
- 第五节 “大东亚之梦”与敌后诸战斗 \_\_ 407
- 第六节 大陆战场之面面战斗 \_\_ 413
- 第七节 太平洋上之曙光 \_\_ 426

## 第九章 抗战第二期（四）

（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四年九月）

- 第一节 抗战后期之国际情势 \_\_ 438
- 第二节 敌军之暮景 \_\_ 443
- 第三节 湘、桂、黔、豫、鄂会战及湘、粤、赣边区诸战斗 \_\_ 449
- 第四节 胜利前夕之反攻追击战 \_\_ 458
- 第五节 轴心崩溃后之远东局势 \_\_ 465
- 第六节 日本帝国之崩溃 \_\_ 472
- 第七节 战时朝野动态（三）\_\_ 481

## 第十章 胜利之页

- 第一节 胜利、受降及复员 \_\_ 488
- 第二节 战后之日本与中国 \_\_ 500

## 附录 抗战史料述评

- 搜集、鉴别与编次 \_\_ 510
- 抗战将领一览 \_\_ 518
- 殉职将领一览 \_\_ 549
- 抗战大事记 \_\_ 552

编后记 \_\_ 571

第六章

## 抗战第二期（一）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年四月）

## 第一节 武汉撤退后之新情势

武汉战后，军事上又转入严重的阶段。敌军沿粤汉线威力搜索，十一月十二日攻陷岳阳。其时，华南敌军已占我广州。敌军可能南北夹攻，打通粤汉路全线，切断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络。我当局为了应付这可能到来的严重局势，曾经准备建立粤汉路以东东南各省的大游击区。为了贯彻长期抗战的计划，也准备“坚壁清野”，来消耗敌军的实力，阻碍敌军的行动。“坚壁清野”，原是旧俄重创拿破仑的战法，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庸性格，与斯拉夫民族的极端性格，极不相同，因此，到了实践的关头，大有出入。岳阳陷落之日，敌军有向新墙河推进的态势。因为情报不正确，前方联络不确实，乃发生了十二日晚间的长沙大火。（时机上失之过早）

大火起于十二日的午夜，数十处同时烧起，到了十四日才完，长沙城中，八角亭、中正路、南正路一带街市以及机关廨署，对河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和第一纺纱厂，都已化为灰烬。全城精华，损失殆尽。我最高统帅以湘省当局措置失当，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撤职查办，警备司令酆悌付军法审判，处死刑，以紧急处置平息舆情。当时敌方即利用长沙大火为口实，作分化我抗战阵线的宣传，敌军也就退保岳阳，等待我们内部的分化。为“败战心理”所中的汪精卫也就正攻击“坚壁清野”的战术，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作投降的准备。（他曾以副总裁名义发表谈话）

其时敌酋近卫，认为政治进攻足以辅助其军事进攻，乃开始诱降的阴谋。十一月三日，近卫即发第二次对华声明，略谓：

……帝国之所期待者，在乎建设能保“东亚久安长治”之新秩序，此次出师之最终目的，亦即在此，所谓“建设新秩序”，即由日、华、满三国相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而确定国际正义，达到共同防御，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此即所以“安定东亚”、裨益世界进化者也。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

言下之意，就希望“其他人员”来做日本的傀儡，分散抗战的阵线。所幸我们的统帅，意志非常坚定，武汉撤退之日，即发告国民书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国民参政会即决议拥护总裁领导抗战，国策决不变更。近卫声明发表之明日，英美法舆论一致抨击，谓“亚洲为亚洲人之亚洲”为诞语，十一月八日，英国外交部声称全力援华，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汪精卫准备投降的意兴，迎头受了打击。十二月十六日，敌政府恼羞成怒，乃公布了“兴亚院官制及兴亚院连络官制”。（采用船田法制局长之意见）十二月二十二日，敌酋近卫又发第三次对华声明，略谓：

日政府已决定：一方继续进行其军事行动，俾完全消灭反日之国民党政府，一面与眼光远大之中国人民，共同合作，建立东亚之新秩序。查中日满三国将来，将以建立“东亚新秩序”，睦邻亲善，共同反共及经济合作，为其共同之目标。中国今日应即首先祛除一切狭小偏见之观察，及放弃其反日怨懣之愚蠢政策……

事后推寻，字里行间，可见汪精卫与敌酋间秘密勾结之迹。从汪精卫对外国记者明白表示“中国未关闭第三者调解之门”（二十七年七月间）到公开斥责“焦土抗战”政策（十一月），到潜行离渝飞昆往河内，公然背叛党国，这条迂曲的路，在当时属于内幕新闻，很少有披露的机会。现在且引用当时参与内幕的端纳顾问（W. H. Donald）的一节通信〔与友人田伯烈（H. J. Timperley）书〕，以明当时的曲折。他的信中说：

……中国之继续抗战，是绝无疑义的。中国目前绝无和平可言；如要和平，惟有日本直接的明确的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汪精卫离开了重庆，到云南的时候，提过讲和的话。外间因此传言，谓汪氏实在系替政府做双簧；这句话，确实够得上是谣言的本色。你要知道，汪精卫彻始彻终，是无权替中国谈和平的一个人。

汪精卫向来是亲日小组的领袖。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他的党羽便赤诚表示为国家而努力，因此，汪氏便变成空头领袖。汪氏脑海中，于百无聊赖之际，幻成一种空中楼阁，认为：倘能够和日本弄成一种似是而非，虽勉强，但仍可庶几的条件，便会吸引到一大部分贪图苟安的人；汪氏既动了念头，一部分无聊的二三流党羽，便开始活动。我想，他们要直接的和日本人交涉是办不到的；间接和日本人交涉，捕风捉影，却有可能，二三流党羽得到一种“虚无缥缈”的结果，加上了汪氏的“空中楼阁”，于是事实便具体化了。照我所知道的，中国军队撤离汉口之后，当时这一班人仍留在汉口活动的。

蒋委员长曾于十二月二十日飞往西安，视察军事，未起飞之前两日（十八日），夜深的时候，汪氏往见蒋氏，说要飞到成都去演讲，这当然是平常的事。委员长到了西安，忽而收到云南龙主席的电报，大意是汪氏忽然飞到昆明，告龙主席谓，就彼个人的意见，和平大概有一点希望，请龙主席帮他的忙。汪氏又谓，委员长曾两度说过：倘中国不至于灭亡，日本之和平条件是可以接受的。龙主席于报告此事之外，并在电末说：“汪副总裁所言，是否可靠？职不能无疑，未审钧座曾否预闻其事；应如何办理之处，仰候钧裁。”委员长覆电龙主席，大意是说，此事事先并未预闻，目前绝无谈判和平之余地云。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夫妇从西安飞返重庆，这晚聚餐，我亦在座。谈起了汪精卫，蒋委员长对我说：“请你通知英美两国使馆，告诉他们：汪精卫绝对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并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之抵抗。”我立刻打电话到英国使馆通知该馆当时的负责人格林威君（J. D.

Greenway），并请他通知美使馆代办贝克君（W. R. Peck），这时正是晚上七时三十分。

当时的重庆正充满了谣言，日本的无线电台不断地广播，谓汪精卫已逃出了重庆；原因是政治的失败。至汪氏“所干的和平勾当”，日本当时还在梦中。

汪精卫到了河内，对人说：“我之飞往云南，系应龙主席的邀请。”消息传到了香港，可怜香港方面的人，纷纷推测，以为汪氏真的可以和日本讲和。当时委员长还客气，致电汪氏，请其病体稍痊，仍早日返渝。

查近卫宣言，系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近卫宣言中，对于毁灭国民政府的决心，比前尤厉。二十六日，委员长在纪念周演讲，坚决声明中国绝无发起和平谈判之意。关于汪精卫事件，委员长称：“我辈中国人，凡知道国家之艰危及认识目前之时事者均不会想到与日本讲和。汪精卫先生，熟知日本军阀欲灭亡中国之野心，应该对日本军阀深恶痛绝；深望汪氏能返国共同努力，以达到抗战必成之目的。”让我告诉你一点旧事：在一九三七年圣诞节的时候，德使谈和失败了。意大利外交当局忽向汪游说，先之以意使，继之以意大利代办。他们提出：（一）委员长辞职。（二）由汪写信一封到日外务大臣，声明战事停止之后，中国将放弃反日的思想。苟能如此，则日本将以中国易于接纳之条件而退兵。

当时汪精卫尚清明在胸，怀疑意代办何以会向他进言，并说：“我不好意思请委员长写这封信。”事后汪将此事报告委员长。后来意代办又向汪进言，愿意撤回了委员长辞职条件，但求汪写封信到日本外交部。汪也将此事向委员长报告。后来，我从某一个外交家方面听到，汪氏当时，确曾私自对意使提出了书面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意使曾否转到东京，我不晓得；纵使这个条件转到了东京，我想日本也只是束之高阁，没有睬他；因为日本本来晓得在伟大的抗战当中，汪氏没有什么力量的。

去年（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七时四十分，我听到伦敦三十日深夜的广播，谓顷从香港收到消息，汪曾致电委员长，

请其与日本谈和。我听到了便写了一张条子送到楼上蒋夫人那里，请蒋夫人代问蒋委员长，有无收到汪氏电报。蒋夫人复一条子，谓：“委员长并没收到汪氏电报，请代向路透社或其他机关声明。”后来查明，才晓得香港方面汪氏的党羽，擅在报章发表了一篇当时没有拍发的电文（艳电）。

我个人对汪氏的批评是：汪精卫是一个政客，但他却被德意的政客所利用。“和平”，是政客利用政客的把戏，我们要知道：德意想利用日本牵制苏联。但日本却要打中国；德意知道日本此举，结果只有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在德意不免失去了东方的强援；但要叫日本回头，日本又不肯。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利用汪精卫干那与日本中国两不相干的独角戏。

这是汪逆精卫从脱离抗战阵线，发表著名的“艳电”走向做汉奸的经过。汪精卫之为人“实在是个无主张、无目的、无恩怨、无是非的一个怪角。他有着翩翩动人的风度，配上富于煽动性的口才及文之成章的一支笔，所以也能拥有一部分党徒，因而取得党国的崇高地位。但由于他个性之反复无常，不能与任何人合作到底，常会发生负气出走的事，终至跳到做汉奸的火坑里来”。（陶菊隐语）那时，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蓄意要灭亡中国，已很明显。蒋委员长已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纪念周上作严正驳斥，指出：“近卫所谓‘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面合作为基础’。大家要注意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项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络而成的。目的在什么呢？以防止赤祸名义，控制中国的军事；以拥护东亚文明的名义，消灭中国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经济壁垒的名义，排斥欧美势力，独霸太平洋；再以‘日满支经济单元’或‘经济集团’的工具，扼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大家试想，‘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七个字之上，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他又明白指出：“成立所谓‘兴亚院’，这是承接着敌国闹了许久的对华机关而生产的。他们这种做法，是要使整个中国支离破裂，不止亡中国，也要危及

整个的亚洲，这‘兴亚院’是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先一日近卫发表谈话，是‘要筹组新的行政机关，以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机关，依国外各机关，与中国保持连带关系，将成为执行对华政策之枢纽，以实现日本对中国事件之最后目的’。这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务机关！”敌人的阴谋，已经全盘托出；中国应该如何决策，蒋委员长也已说得非常明白。偏是汪精卫通电主和，“艳电”的前面大半段，所谓第一、二、三各点，即是公开对“广田三原则”加以辩护，表示可以承受。他说：“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之声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对于中国无领土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第二点为共同防共……第三点为经济提携，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只有第二点，是修正广田共同防共的办法，由日方自己去应付苏联，而由中国政府对付共产党，分工合作。从电文“至其条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以下，则设法在满足对方认为“自动承认三原则六条件”还不够的情势下的对象。所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即是针对着日方所谓“现在已占领区域，一年以后撤兵”而言，所谓“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亦即对日方所要求“中国境内驻兵”而言。而结束一段，所谓“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更是表示对于广田所提根除“抗日思想”一项要求提必有之保证的意思。“艳电”全文，从头至尾，都是胡话，可见汪逆当时的昏乱，国人乃对之完全绝望了。

汪逆到河内以后，一直逗留到五月初，中央对“艳电”的答复，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中常会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当时，汪即派梅思平、陶希圣、周佛海等赴港。不久，日本人大养健便到河内来了；一月十七日，林柏生在香港被狙击，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在河内被刺死；其后汪逆便发了一篇“举一个例”，为自己的行为作辩

护，说：“我的主张虽暂时不为重庆所采纳，终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恨。”四月二十五日，汪在几个日本特务人员的设计护送之下，乘车到海防，偷偷上了日本人替他所预备的北光丸。五月六日，到了上海。他的汉奸命运就此注定了。（汪逆做了汉奸的种种，后文另详。）孙总理在北平临终的时候，汪问总理有何遗言，总理说：“我死了，你们就会被敌人软化了，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倒真一语断定汪的终身了！

汪逆开除党籍之后三日，近卫内阁便崩溃了，这便是敌人速和速结计划的破灭。继近卫而起的，为平沼麒一郎；他曾于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说：

对于中国事变，天皇已定有确乎不动之方针，现内阁当然依此根本方针，向所期之目的，彻底迈进。日“满”支三国，应立对互相充分理解之上，互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现互助关系，善邻友好，奠定东亚兴隆之基础。中国应谅解，此帝国之大精神，从速协力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如终不谅解此意，继续抗日，惟有使之溃灭。然对中国卓识之士，协助帝国国策之遂行，以期奠定“更生新中国”之基础者，当欣然援助。

演说中并无私意，只是期待一个“新汉奸”的到来而已。

汪精卫出走以后，编者曾作“折冲侧语”，记叙和谈经过如次：

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德大使陶德曼奔走和平，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汪精卫托病去国，这一年间，在抗战激潮边上的和议洄流，颇耐人寻味。现在虚伪和平的最后一环，已经敲断，且让记者从侧面作综合的追溯。在伦敦方面的看法，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间九国公约会议之没有结果，大出他们预想之外。十月底边，国际外交界认为调停定有办法，美国之热心邀请，并非没有把握；不知英美两国上了墨索里尼的当，还是日本外相上了墨索里尼的当？调解之门是给墨索里尼关上的。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春间，记者和某要人闲谈，他说：“十一月以后，我已不作和平的梦想了。”这是真话。

由于日本方面所放的空气，说德国是比英美更适当的调解人，九国公约会议搁浅以后，德大使陶德曼就露头角了，他为了调解，到过南京好多次，在他出面调解中，曾说了这样半恫吓的话：“在南京未陷落前，还可以找一个不亡国的条款；南京陷落以后，那就难说了。”而所谓不至于亡国的条款是怎样的呢？大致如港沪各报所载，除了“承认满洲国”“加入防共协定”以外，还有永久解除中国武装、内地驻兵及赔款等条款。这样陶德曼大使也就自己把调解之门关上了。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这一年的调解，其主流仍由英国方面直接或间接在推动，虽说日本方面并不认为有适当的人。于此，记者先得补叙陶德曼出面调解时，我方一部分要人（极少数）如汪精卫之流，打定了怎样一种接受和议的底子呢？他们主张自动承认广田所提的三原则六条件。也许对方知道了这个底子，所以其提出条款，侧重“解除武装”及“内地驻兵”两点。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一年间三番五次的，没有结果，就是日本方面仍在“解除武装”及折冲“内地驻兵”上做文章，而其最巧妙的笔法，是把“内地驻兵”做成了已“占领区域”，一年以后撤兵。当英大使在推动调解之门时，伦敦方面曾一度非常乐观，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已有外交界人物预言四五月间战事会结束。

武汉陷落以后，那极少数意志薄弱的要人曾一度非常动摇。其最显露的表征，即汪精卫在重庆曾对海通社及美联社记者表示可以接受和议。就在汪发表谈话前后，有一半可信的传闻，日方曾这样表示：“要和议的对手，是一个适当的人，条款可以非常客气，客气到世界各国都不敢相信。”言外之意，只要议和的对手是汪而不是蒋，“和平”定价，就可以十分克己（客气），这是对于汪精卫的最大的诱惑。

但是，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站在调解之门的边上，抱定一定的战略。他认为调解之门不妨打开，但调解基点必须建立在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上。他曾对某大使明白表示：“中国决不能做捷克，更不能做阿比西尼亚。”而蒋委员长对于军事上增加了胜利的信念，更坚决他对于外交的既定战略。这回汪精卫因羞去国，不但抗战方针全无变更，在政府方面，更可说是对于虚伪和平的折冲表示冷淡。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同床异梦”；这句成语，正可用以形容虚伪和平

折冲过程中的各方面的心理。在日本方面，认为和平条款，不仅要中国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认为这次就算和平下来，也不过是暂时的休战，希望于五年或十年后那一次大战中，一下子打毁了中国的实力，就非尽量培植汉奸（三个政府合流的奇谈）、控制军事要点（南京、徐州、上海、汉口、郑州、广州驻兵）、吸收资源（华北经济合作）不可。无论近卫的宣言，这样那样说了多少次，弦外之音还是这几句——广田三原则六条件加“解除武装”及“内地驻兵控制军事要点”。

英国方面所拟议的和平条件的底子，正面文章尚不可知，其侧面影子，大体不离现实主义的一贯办法，它希望中国承认既成事实，牺牲一点。牺牲到什么程度呢？“满洲国”是非承认不可的，华北经济和日本有特殊关系，也非合作不可的，这是大概的限度。去年春间由伦敦方面来的外交界要人，曾经这样说过。而且三月间，汉口某报曾发表过一篇注解“抗战到底”的“底”字限度的文章，其中说“底”的限度在长城以山海关为终点，这就暗示不妨承认“满洲国”的意思。

德国希特勒的打算，和英国绅士的打算当然不同啦。他要帮助所谓东方的朋友，使他成为包围苏联的支柱，叫中国尽量牺牲，满足他的朋友的军事上、经济上的需要。同时，又想保持中国这个市场，不让中国全部倒下去。据从柏林方面传来的闲话，说希特勒的言外之意，仿佛以为拥有黄河以南的中国，就足够大了。其意有叫中国把内蒙古、甘肃、山西、河北、山东都割给他的朋友的必要。

但是，在日本方面，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态度还是一个重要的因子。因为墨索里尼颇想拉住日本的海军来牵制英国，日本呢，也想拉住意大利的海军来牵制英国，意大利方面虽没有和平条件的底子，以往调解门户的紧松，和他极有关系。

不过，无论对方或调解方是否在做梦，蒋委员长这方是清醒的，这就是一切底子成为单相思的主因。

对于坚决的抗战国策最有利的条件，还在于军事上的调整与进步。武汉撤退以后，我最高统帅曾召集长沙、南岳、西安各次会议，对第二期作战，作如下之部署：